



## 流动农业工人:概念特征、经济动态与理论视角

孙雨奇 刘阳琳 张 森

**[摘要]** 农业劳动力问题是农政转型与变迁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不仅聚焦对该群体及其背后流动现象的关注,还涉及其对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方面的多重影响。本文通过对国际农政研究领域的英文文献进行梳理,呈现了流动农业工人群体的定义、特征与生成机制,并从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生计框架五个经典农政理论视角出发,展现了当前英文学术界围绕该议题形成的核心观点和研究旨趣,进一步揭示了该现象背后蕴含的丰富研究内容和重要研究价值。以雇佣劳动替代家庭劳动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过程,尤其是在蔬菜、水果等特殊农产品种植区域,雇佣流动农业工人普遍存在,是农业经营主体应对季节性劳动力需求高峰的主要方式,也是确保特殊农产品供应安全的保障。因此,应在学术研究与制度建设方面对中国流动农业工人给予更多关注,以构建更公平、规范和更具有支持性的流动环境。

**[关键词]** 流动劳动力;农业工人;劳动体制;农政转型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240724.007

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必备的要素之一,劳动力问题也是农政转型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亨利·伯恩斯坦(2011:1)认为,“了解现代社会的农政变迁的重点在于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它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力的基本社会关系基础之上:资本为追逐利润和积累而剥削劳动力;劳动力不得不为资本工作以获得生活资料”。在传统社会,农业劳动力主要由家庭成员构成,传统小农会在特殊生产环节以社区内部互助劳动的形式来应对季节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被商品化,大规模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远超小农场,雇佣劳动力成为农场维持生产的必要手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本国或本地劳动力存量已经无法满足大型农场的用工需要,尤其是无法满足季节性用工的高峰需求。因此,大量移民劳动力涌入这些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些流动农业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转型研究”(20&ZD163)。

**[作者简介]** 孙雨奇,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与社会研究院博士生;  
刘阳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张 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通讯作者。

人成为重要的农业劳动力来源。

雇佣流动农业工人最初只是“例外状态”下的临时性应对策略,但在如今的农业生产中已经成为常态(Hennebry & McLaughlin,2012; Weiler et al.,2017)。据相关报道,美国农场雇用了约 250 万名流动农业工人,约占全美农场工人总数的一半<sup>①</sup>,尤其是在农业较为发达的加利福尼亚州,流动农业工人占全部农场工人的比例高达 79.3%<sup>②</sup>。在意大利,有超过四十万的临时海外移民补充了该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缺口<sup>③</sup>。英国农业部门也面临巨大的季节性劳动力缺口,调查显示,英国有数百个大型农场极度依赖季节性工人,截至 2023 年,英国已成功颁发 4.5 万份园艺部门季节性工作签证以及 2 000 份家禽生产部门季节性工作签证,这在临时工人签证中占重大比例<sup>④</sup>。澳大利亚为了将下一代移民引入本国的乡村和偏远地区<sup>⑤</sup>,也于 2021 年调整并确立了新的农业签证政策,规定来自亚洲国家的农业工人有机会在澳大利亚获得永久居住权。

在中国,流动农业工人成为商品化农业产地的重要劳动力类型,尤其是在大规模的棉花、甘蔗、特色水果等劳动力密集的种植区域,他们是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然而,当前关于中国人口流动的研究,大部分目光集中在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流动(Andreas,Zhan,2016),较少关注农业部门内部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更少对流动农业工人这一群体开展研究。与之不同的是,在国际农政研究领域,围绕流动农业工人的研究拥有长期的学术传统,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农政转型与变迁的诸多议题,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将流动农业工人视作转型过程的参与者,还将其视作推动农业变革与转型的关键元素之一,并广泛探讨其给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农政研究领域对流动农业工人的研究成果,考察该领域中的主要研究议题和不同理论视角的学术贡献,一方面呈现该主题所关联的重要学术命题,另一方面揭示在中国农政转型背景下关注该议题的重要意义。

① Melody Isley,The unseen plight of undocumented workers in the US during the pandemic,World Socialist Web Site,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20/12/07/immi-d07.html。

②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Farms,New American Economy,https://www.newamericaneconomy.org/issues/agriculture/。

③ 联合国粮食权问题专家:意大利粮食系统在剥削小农户和农业工人,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50162。

④ Why do people come to the UK? To work,https://www.gov.uk/government/statistics/immigration-system-statistics-year-ending-december-2022/why-do-people-come-to-the-uk-to-work。

⑤ 澳大利亚新农业签证将生效 亚洲国家移民有机会获永居,http://www.chinaqw.com/hqhr/2021/08-25/305895.shtml。

## 一、流动农业工人的定义及其特征

美国国会在1983年4月颁布的《1983年移民和季节性农业工人保护法》(*Migrant and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Protection Act of 1983*)中,将流动农业工人(*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定义为:受雇于季节性或其他临时性质的农业部门,且必须离开其永久居住地过夜的个人,流动农业工人不包括雇主的直系家庭成员,也不包括获得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批准在美工作的外国人<sup>①</sup>。对于流动农业工人的概念,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通用且明确的定义,在既有研究中也较少出现概念争辩。不过有学者提出,若想深刻理解这一群体的重要作用,要将其放在工业化农业经济体系中去理解,因为这种经济体系通过雇佣不到2%的劳动力就能养活整个国家(Rothenberg, 1998:62);还有学者直截了当地将这一群体比喻为“流动收割机或播种机”(Peard, 2013)。这些描述刻画了流动农业工人群体的特征,一方面证明了他们受雇于农业部门,并从事劳动密集型农业工作的事实;另一方面突出了该群体存在定居地与工作地时空分离的特征。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属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农场用工体系的临时性特征,季节性农业工人会在较短时间内被安排密集的工作,并且工作的农场和居住点大多远离当地社会的社交场所,这使得他们在有限的流动周期内,无法熟悉当地的社会和制度环境。此外,由于缺乏集体组织和专门机构,他们既被孤立于原籍地的社会网络和支持系统,又与东道国的社会隔绝(Bogoeski, 2022)。由于南方国家政治冲突持续存在,大规模移民潮仍在全球范围内上演,难民、寻求庇护者、过境移民、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偷渡者等不同身份的工人,因其极端贫困的生活水平,开始选择长期定居在东道国的农村地区,这导致上述周期性的流动状态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永久性特征(Pelek, 2022):有的流动农业工人在工作地集聚形成了一种新的农村社会空间形态——“农村贫民窟”(Pelek, 2022),有的流动工人开始掌握地方性农场的主导权,甚至转变为农场主(Minkoff-Zern, 2018)。

## 二、流动农业工人的经济动态:生成机制、市场供需与支持框架

传统上,农村被看作是人口外迁之源,而非吸引移民之所。然而,在近几年间,国际学界开始关注低收入劳动力向农业集约化区域的迁移现象(King et al., 2021)。

<sup>①</sup> H. R. 7102-Migrant and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 Protection Act, Congress. gov, <https://www.congress.gov/bill/97th-congress/house-bill/7102>。

目前,有大量流动农业工人涌入这些对劳动力需求上升的农村地带。类似于传统移民研究中对人口流动的动力分析,流动农业工人现象的背后也存在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动因,受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系统对自然地理条件的依赖性、作物种植的季节性、集约化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增长,共同催生了对流动工人的短期需求。劳动力市场的互动作用,影响了农业工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各类组织和规划机构也为流动农业工人提供了社会与政策方面的支持。在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性框架,用以全面呈现流动农业工人的经济动态。

### (一) 流动农业工人生成的一般性动因

舒尔茨(1990)认为,人口流动现象与政治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经济因素通常被视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韦伯,1997)。流动农业工人本质上属于人口流动,根据经典的移民推拉理论(De Haas,2010),无论是跨国流动,还是国家内部的城乡流动,迁移人口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追逐更高的工资,以改善自身境遇,过上更好的生活(舒尔茨,1990)。以家庭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指出,流动决定不是由孤立的行动者做出的,而是家庭共同决策的结果,这体现了家庭劳动力分配的多样化特征。有学者通过中国的案例发现,小规模农业为家庭提供了生产动力,因此将家庭劳动力类型分为农业就业和城市就业,可以有效利用劳动力,实现家庭收入多元化(Yan et al.,2014)。还有学者持相对剥夺理论的观点,认为农民流动并不一定是为了增加家庭的绝对收入,而是为了改善家庭相对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地位(Stark & Taylor,1989),农村社区内部的收入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被相对剥夺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选择外出务工(Stark & Taylor,1991)。

此外,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的收入预期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odaro,1977)。例如,有实证研究发现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获得工作的可能性更高,并且预期收入高于墨西哥城市地区(Escobar-Latapí,1999)。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流动的原因,认为城乡收入差距会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而这种流动只有在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先进工业部门吸收后才会停止(Lewis,1954)。

可见,人口流动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结构领域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共同结果,既与全球发展格局密切相关,又深受地区发展阶段的影响,不同时空条件对该现象的具体驱动机制各不相同。

### (二) 全球农业转型对流动农业工人的市场需求

流动农业工人是全球人口流动浪潮中的重要群体之一,其出现与特殊的农政转型与变迁背景紧密相关,通过雇佣劳动力满足大规模农场的劳动力需求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韦伯通过对19世纪末德国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研究发现,德国国内劳动力存在从东部向西部流动的特征,而东部集约化耕作的劳动者由波

兰人补充。随着一些流动人口禁令的废除,德国还出现了从北部向东部的人口流动,以及从俄属波兰与加利西亚向德国东部的人口流动,这些人口愈发成为德国东部四省甜菜种植的劳动力来源(韦伯,1997)。在这一时期,除德国外,欧洲其他国家的劳工也获得自由通行权,开始季节性地前往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收割小麦(Scobie, 1964),或被招募到巴西咖啡种植园工作(Stolcke, 1988)。在美国,农场大量雇佣流动农业工人的现象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有研究指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农场几乎都由农场主家庭或当地社区劳动力种植和收获,但到1910年,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农场,到1950年,这一数字已经不足五分之一,这意味着流动农业工人群体承担着大量农场劳动(Peard, 2013)。通过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可见,流入地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是催生流动农业工人群体出现的首要结构性要素(汪淳玉, 2022)。

20世纪末以来的经济增长使欧洲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各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了农业劳动力危机,越来越多的大规模农场寻求从人力向机械力转型。但在水果、蔬菜、经济作物等特殊农产品产地,人工仍然是农作物生长周期中必要的生产要素。例如,西班牙作为欧洲主要的水果和蔬菜生产国,必须要通过引进罗马尼亚劳动力以弥补国内农业生产的需要(Molinero-Gerbeau et al., 2021)。土耳其南部由棉花种植区转向柑橘类水果和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区过程中,招募了大量来自库尔德地区的农民和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以补齐农场中的劳动力缺口(Pelek, 2022)。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作物种植区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泰国为应对国内农业人口衰减,2010年以来不得不吸引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的流动农业工人前来,以确保粮食、咖啡、橡胶、养殖等农业产业的持续发展(Thetkathuek, Daniell, 2016)。

此外,全球的土地集中化进程也催生了流动农业工人的出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土地的行动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过程,这些行动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农场的建立,还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资本迫使农民放弃土地并推动他们到资本主义工业园区从事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作,这促使了新的“剩余人口”的产生(Munck, 2013)。在1985年的巴西,10%的人掌握着全国80%的土地,大量巴西农民被迫离开乡村寻找就业机会(Wolford, 2010)。有学者发现,尽管资本在集中土地的过程中作出了保障当地社区居民就业的承诺,但是由于缺乏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法律条文或行动组织,这类就业承诺往往成为一纸空文(Gyapong, 2020)。攫取土地行为造成的失业问题和形成的无就业增长模式已经相当普遍,因此有学者提出要将劳动力置于思考攫取土地问题的中心位置(Li, 2011)。

可见,农业资本主义转型导致了地区乃至全球农业部门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农业生产方式变迁同时带动了农地组织形式、农民就业方式以及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整,农民的流动和农业部门对大量雇佣劳动力的需求共同促使了流动农业工人群体



出现并长期占据重要地位。

### (三) 流动农业工人的支持组织与计划

流动农业工人的重要意义引起了欧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重视,他们为这一群体提供了工作信息和保障计划,尤其是对季节性的流动农业工人采取了明确的政策以实施干预。以加拿大为例,该国政府长期施行季节性农业劳工计划(SAWP)和临时外籍工人计划(TFWP)。始于1966年的季节性农业劳工计划是为促进加拿大农业部门的经济而制定的国家级农业工人流动计划,尽管该计划允许外籍农业工人进行多次循环流动,但他们每年最多可以在加拿大工作8个月,必须在当年12月15日之前离开加拿大(Caxaj et al., 2022)。临时外籍工人计划于1973年开始实施,最初是引进高技术人才的专项计划,在2002年又增加了低技术工人的指标,为农业工人的进入打开了新通道<sup>①</sup>。在亚洲,日本政府自1932年至二战结束期间有计划地组织实施了一项名为“农业移民”的政策,旨在将日本农民和朝鲜半岛居民有序迁徙至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农业开发(McDowell, 2003)。

然而,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流入国的移民制度通常会设有相对严格的限制条件,以控制流入人口的数量和类型。流入国定义不同层次的从属关系、歧视和区隔,从而满足自身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需要(汪淳玉, 2022)。因此,民间的私人计划作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具有重要意义(Molinero-Gerbeau et al., 2021),劳务承包商或劳务派遣机构扮演了重要的组织者角色。在欧盟,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劳务分包商或临时就业机构雇佣,参与短期的跨境工作(Favell, 2008; Kalleberg, 2009)。在美国,种植者和农业工人则长期依赖分包商作为中间人(Peard, 2013)。这些劳务机构主要通过互联网发布招聘广告,直接从劳动力流出地组织工人前往流入地,还有一些机构和那些参与过国家劳动引进计划的人口取得联系,说服他们通过私人计划实现异地就业(Molinero-Gerbeau et al., 2021)。例如,一些缅甸流动工人通过马来西亚雇主资助的“客工”计划进入马来西亚务工,他们拥有特定时间的工作许可证和通行证,但在合同完成后,会被雇主强制返回原籍国(Htay et al., 2020)。相比正式的国家支持计划,私人承包商存在虚假宣传、不正当收费等风险,流动农业工人常常因工资低、被非法克扣工资和工作时间不稳定等问题而负债累累(Caxaj et al., 2022)。

除了官方与民间的移民机构,流动农业工人还会自发形成非正规社会网络,同时依靠与原籍地家庭和当地移民社区的联系,为他们在流入国的生存寻找支持。来自同一地区并率先获得稳定生活的移民会在流入地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为新加入的流动人口提供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降低他们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和风险(Massey,

<sup>①</sup> Amanda Pfeffer, Rise in foreign temp workers questioned by labour groups,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rise-in-foreign-temp-workers-questioned-by-labour-groups-1.1361027>。

1987)。随着流动人口的循环往返,这种社会网络得以在流入地的移民当中持续运行(Çaro et al., 2014; Massey, 1987)。新移民的加入将扩大这个网络的社会联系范围,并促使更大规模的流动产生(Mines, Massey, 1985; Reichert, 1981)。这些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建立,为流动工人应对来自官方的经济与社会福利排斥创造了一个极具意义的抗衡空间,使具有共同利益的流动农业工人在争取合法劳动权益和薪资报酬的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议价权(Zajak et al., 2017)。

### 三、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流动农业工人研究

农政研究拥有非常明确的研究内容和旨趣,旨在“考察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发生的重大结构转型和变迁及其具体呈现”,围绕这一经典命题,国际农政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五个主要理论视角(叶敬忠, 2022)。面对农业资本主义转型进程,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流动农业工人现象进行了分析,围绕该主题提出了丰富多彩的学术问题并加以解释。

#### (一) 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视角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在农业领域,土地将被资产阶级农场主占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将转变成成为被雇佣的无产阶级劳工(叶敬忠, 吴存玉, 2019)。考茨基(1955:213)进一步指出,即便土地没有被资本主义农场侵占,农村的土地碎片化也注定了小农将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家庭生计。列宁在早期作品中鼓励农民通过流动成为雇佣工人,并且认为这一过程不仅可以给农民带来纯粹经济的利益,还可以突破封建劳动关系对农民的控制,并且,他通过对各地区农业发展情况的调查,发现俄国的农民早已成为资本主义农场的雇佣工人(列宁, 1957:193)。考茨基也考察了德国国内农业工人流动的部分案例,他将那些受雇佣的跨区域劳动力形容为“流浪的工人”(考茨基, 1955:431)。不过,与列宁的视角有所不同,考茨基侧重解释这些流动农业工人的不幸处境。考茨基(1955:430-432)认为,这一群体不仅无法在雇主那里享受住房和健康保障,还会受到中间人的盘剥,中间人会将高强度、低报酬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劳动分配给那些远道而来的劳动者,并从他们的工资中抽取佣金。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流动农业工人的被雇佣性质,认为农民一旦成为工人(无论是农业工人还是工业工人),就会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改造为商品化的、抽象的人,成为被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对象(马克思, 2014:62-63)。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采用“中心—边缘”范式来解释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心”代表世界上富裕的发达国家,“边缘”则指贫穷的发展中国

家和落后国家。这些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将欠发达国家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这一人口流动格局将加剧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持续依赖,进一步强化了以牺牲落后国经济为代价的国际发展格局。因此,20世纪60年代,移民有助于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的观点遭到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这些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将流出地中最健康、最有活力和最有生产力的劳动力输出到其他国家,不利于原籍地存续人才资源(De Haas,2010)。新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劳动力在流入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剥削与压迫,这一观点已经在很多案例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一项关于季节性农业工人的研究指出,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工人相比,季节性流动农业工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剥削和不稳定生计,他们不仅因自由流动的限制而无法返回原籍地,还因为临时工人的身份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与保障,也不能形成集体组织以构建本地化的社交网络,这种双重隔离的生存处境使他们只能高度依赖雇主,强化了当地资本对这一群体的剥削结构(Bogoeski,2022)。另一项关于印度跨省流动农业工人的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凸显了流动农业工人在流入地生存处境的脆弱性,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富农阶级为了控制成本,强迫这些流动的低种姓农业工人以极低的工资水平进行劳动,导致该群体缺乏基本的生活健康保障以应对大流行疾病的蔓延(Kaur & Kaur,2021)。

这些研究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批判了经济帝国主义的复兴,指出其通过掠夺性手段追求廉价且灵活的劳动力,加深了全球以及内部的不平等。在这种状况下,由经济困境所驱动的非自愿劳动力迁移被视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塑造灵活劳动力的最有效途径。这也批判了一些学者关于通过灵活的劳务移民政策而实现雇主与劳工“双赢”关系的理想化观点(Portes,2014),因为在农业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农业工人,尤其是无证或非正规移民工人,他们充当着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新鲜的劳动力后备军(Foster & McChesney,2017:485-502),却处于最受剥削的地位,暴露于极端不稳定与脆弱的处境之中。

## (二) 抵抗的共同体:实体主义视角

实体主义学者关注农民在面对资本主义剥削结构时的自主性问题。例如,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生产和消费具有动态的均衡性,遵循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吴晓燕,2006)。因此,小农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失去土地并成为受雇佣的无产阶级,而可以通过小农家庭农场的合作化来对抗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冲击(叶敬忠,张明皓,2021)。另一位代表性学者斯科特(2001:39)提出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认为农民的行为动机和村社的制度安排都以“避免风险”和“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为内在指向。在此基础上,斯科特进一步提出了“弱者的武器”概念,用以描述被压迫工人日常表达能动性的低姿态抵抗形式(Scott,1985)。他认为,资本施加权力的方式在不断变化,因此抵抗也不是普遍的、同质的,而是多维的、复杂的、微



妙的。斯科特强调,弱势行动者们在对权威的服从表现之下所进行的非正式行为,是他们表达政治利益和公平诉求的重要手段。这些底层行动者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塑造自身现实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精心选择抵抗的时机,并通过一种隐蔽的形式,不断进行谋求生存和修复受损生活的持续斗争(O'Laughlin,2022)。总体而言,实体主义关注的是行动者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联合与抗争,该视角将小农的自主性置于中心位置,认为其在塑造自身生计和影响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小农特质能够激活更人道、更有效的发展方式,将他们从依附和被剥削的历史地位中解放出来(潘璐,2012)。

流动农业工人的自主性在灵活协商工作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中得到彰显,在面对官方机构和制度规定的不平等时,他们会积极争取个人和集体的生存权利与尊严。有研究发现,尽管加拿大临时移民工人计划因其苛刻对待流动人口而臭名昭著,但工人们仍然在跨国空间的多层压迫之下,找到了创造性的、集体性的方法来抵制雇主对他们的持续剥削。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农场工人将掩饰行为(dissimulation)作为一种隐蔽性策略,他们动员同事或移民社区中的联系人来帮助掩护,自己则冒着违反劳动法规和失去工作许可的风险,在下班时间去农场或其他行业寻找兼职。此外,合作式的隐性抵抗也屡见不鲜,为了防止个别工人因工作速度缓慢而受到雇主特别关注,工人们会根据当天的任务总量,提前协商并调整工作节奏,来抵制雇主对他们劳动力的过度剥削,避免个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况(Cohen & Hjalmarson,2020)。

此外,农业工人的抵抗策略呈现出性别化特征。一些国家的外籍劳工政策依靠强制手段对男性工人进行剥削,通过贬低其工作价值、个人自尊与传统男性气概,使他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被边缘化。面对政策挤压,一些外籍男性农业工人采用了“遗忘策略”(forgetting),即暂时忽略主流社会对于男性的性别期望(例如强硬、健壮、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这种策略被用来重新肯定他们在农场的存在,并应对政策和制度的约束(Thomas,2020)。在这个过程中,男性气质展现出流动性、适应力和变革性,这种适应性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对男性农工确保生存至关重要。另外,“逃离”(escape)作为一种直接反抗手段,也是流动农业工人的一种选择,它为他们提供了有尊严的自主性表达方式(Perry,2020)。在加拿大的临时外籍劳工计划中,为了逃避强制剥削和恶劣的工作生活条件,一些流动农业工人会选择主动离开,试图摆脱雇主和国家的控制。然而,有研究表明,逃离虽然赋予他们行动的自由,但也可能将他们置于另一段不稳定的道路(Goldring et al.,2009)。

由此可见,流动农业工人的日常抵抗和协商策略是研究移民作为个体行为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日常行为不能被简化为简单的应对机制,而是对权力关系协商的勇敢尝试(Lenard & Straehle,2012)。剥削是司空见惯的日常,抵抗也是如此,在面对不自由的劳资关系与强制权力时,流动农业工人们灵活地发挥个人能动策略,

积极地为尊严和权利而斗争。

### (三) 理性的迁徙者: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均衡分析为特征,信奉理性假说,认为人作为“理性人”,可以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在现有组织结构的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Furubotn, Richter, 2010)。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其根本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理想的市场秩序下,个人的自利行为最终有可能会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卢现祥,朱巧玲,2012)。然而,人的理性活动也会因为现实制度的约束而产生交易成本。

在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流动农业工人被视作理性的迁徙者。他们为改善个人或家庭生活境况而流动,并依据原籍国与流入地实际或预期的收入差异以及就业机会来做出流动抉择。大量涌入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寻求更高工资水平的农业工人正是这种市场驱动流动现象的证据。不过,除了对直接经济收入的考量之外,流动本身也有利于劳动力完成自我投资。有学者认为,劳动力在流入地所获得的非经济利益可能具有更大的可塑价值(舒尔茨,1990)。例如墨西哥农村地区的一部分农民选择流动至其他国家,主要是为了在流入地获得更广泛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并提高获得优质就业机会的可能性(Carvajal et al., 2023)。

此外,劳动力流动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可以促进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Massey, 198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古典主义的支持者乐观地认为人口流动是推进现代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一方面,流动农业工人在东道国的食品生产、多功能农场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De Rosa et al., 2019; Fitting et al., 2023)。有研究表明,该群体凭借丰富的农业技能和经验,已经成为加拿大很多农场中的主要劳动者,并成为加拿大实现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之一(Weiler et al., 2017)。在欧盟国家,当本地农民不愿意承受水果和蔬菜生产的工作条件和低工资待遇时,外籍流动农业工人迅速成为该行业的主力。另一方面,流动农业工人向原籍地的汇款为其家庭和社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De Haas, 2010)。在越南,流动工人寄回家乡的汇款成为提升本土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通过对这些汇款的再投资,他们的家庭和所在社区不仅改善了农业技术和设备,还提高了农作物的质量和产量。这一过程有效提升了当地农民的生计水平,对于改善社区的经济状况和缓解贫困问题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Huy & Nonneman, 2016)。此外,汇款的流入还促进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从而间接加强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效能(Amakom & Iheoma, 2014)。

由此可见,流动农业工人作为理性的迁徙者会根据现实的情况为个人和家庭的生存与发展而流动,他们的流动不仅加速了劳动力资源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有效分

配,还为劳动力的流出地和流入地带来了双向发展的积极效应。具体而言,流出地可以通过汇款等形式获得资本输入,促进当地经济的多样化与社会福利的提高;而流入地则通过吸引外来劳动力满足产业扩展的人力需求,推动农业与经济发展。然而,这种流动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导致了优质劳动力向经济更发达地区集聚,造成了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严重,进而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状态。

#### (四) 被制度消解的个体: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强调生命政治,尤其关心国家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对人们生活的干预(叶敬忠,汪淳玉,2018)。有学者研究发现,现代国家通过“使其生”和“任其死”的组合策略使一部分人过上相对较好的生活,而使另一部分人自生自灭,那些外国的、农村的、年迈羸弱的人最容易被选择性放弃(李,2016)。持这一理论视角的学者发现,资本家在攫取土地之后并不会选择雇佣当地劳动力,转而偏爱从其他地区雇佣流动劳工,因为空间的远距化更有利于雇主实现对工人的劳动控制和规训(Li,2010)。当前,世界正在以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和健康食品的名义刺激劳动者持续迁移,这一过程使劳动者持续遭受家庭分裂,即便有更高的工资收入,也不能代表他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Weiler et al.,2017)。

有一些国家已经推出相对友好的移民政策来促进跨国农业工人身份的合法化,这在北美地区尤为明显。美国政府于1942年与墨西哥签署了政府间协议,正式允许墨西哥农业工人在美国农场临时工作(Peard,2013)。加拿大政府也颁布了各种政策推动海外季节性工人合法化进程,例如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季节性农业劳工计划和临时外籍工人计划。然而,由于劳动者和雇佣者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促进该群体身份合法化的政策并不一定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态(McLaughlin & Hennebry,2015),流动农业工人始终处于一种“排他性包容”的尴尬境地(Agamben,1998)。他们以非正式或临时身份进入一个国家,在工作机会方面受到法律和政策的“包容”,但在社保、劳动权益、居留权等方面又被“排除”在正规体制之外。例如,加拿大的季节性流动农业工人会被自动扣除一部分薪水用于支付加拿大的国民福利,却在申请当地福利时面临诸多限制(Preibisch & Otero,2014)。因此有研究直接指出,流入国通过人口管理政策引进外国劳工以解决本国劳动短缺问题,但却将这一群体排除在合法公民权利之外(McLaughlin,2009)。

还有一部分学者专注揭开隐蔽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平等事实。例如,有学者认为生态农场只是在名义上将农业工作包装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工作类型,但在实践中却通常更依赖人力而非机械化生产,导致工人劳动强度的增加,进而影响农业工人的福祉(Weiler et al.,2016)。在集约农业生产中,西班牙穆尔西亚的雇主通过控制工人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和工资这一组合式的权力实践,增加了工人的劳动负担和身体负荷,目的在于缩减他们在劳动之余寻求其他就业、扩展社交圈和参

与正规教育和培训的时间,这进一步导致了流动农业工人的第三重隔离,即社会文化的边缘化。尽管流动农业工人在确保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却在社会融入和文化认同上遇到障碍,他们被包容在经济生产体系中,却在社会结构中被排除,这损害了工人的社会再生产能力和过上尊严生活的可能性,并最终导致了工人自我剥削的恶性循环(Navarro-Gambín & Jansen, 2024)。

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视角强调流动性和解构历史叙事的重要性,挑战了传统资本主义对身份和阶级的看法(Pfeffer, 1998)。该视角认为,流动农业工人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产物,也是在权力、知识和话语构建中不断重塑自我身份的主体。这些工人群体体现了全球化进程中对可替换性和灵活性的追求,同时,在此名义下,更显露出社会结构对其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边缘化。流动农业工人的脆弱性并不单单是基于他们先天的身份与资源禀赋,例如公民身份、国籍、社会地位、性别和种族等,还受到国家农业资源分配与整合体系的影响,部分国家的剥削性条例加剧了流动农业工人生计的不稳定性。他们的经验与身份在不同文化和经济背景下相互作用,其劳动和生活状态也促使研究者在劳动和移民双重叙事下重新认识这一群体,这将不断挑战着法律、政策和伦理对于劳动、个人权利和社会归属的传统理解。

#### (五) 务实的行动者:生计框架视角

1992年,钱伯斯和康韦首次提出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即基于微观现实来理解农村发展与农民的生活体验(Chambers, Conway, 1992)。生计框架视角主要关心农民的生计问题,认为小农可以通过复杂的生计安排实现个人及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叶敬忠等, 2019)。在农政研究领域,生计框架已被证明是一种理解流动农业工人行为的重要理论工具,该视角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一种策略。相较而言,马克思主义等结构主义视角将农民视作市场和国家行动框架下的被动主体,处于被剥削的牺牲者地位,而依托生计框架进行的实证研究实现了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在复杂的劳资关系与权力动态中,农民是能够利用各种资源,积极构建生计策略且有能力改变社会结构的行动者(叶敬忠等, 201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新性的生计策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外部环境、制度、政策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Cahn, 2006)。

流动农业工人的生计资源通常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等(Tanle, 2015)。自然资源主要是所处地区的土地、水、树木等常见的环境资源;经济资源包括货币、贷款和储蓄能力,例如,流动农业工人能否负担得起当地信贷对于他们制定生计策略至关重要;人力资源涉及技能培训、教育机会和医疗健康等,这对于提升流动农业工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力质量等意义重大(Meikle et al., 2001);社会资源由社会网络决定,流动农业工人的社会关系有助于他



们获取就业信息,并作为他们在危机期间的安全网。文化资源包括个人或社会群体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语言,这是流动农业工人寻找归属感和社区认同的精神基础;物质资源则包括住房、教育、保健、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综合而言,流动农业工人可以根据不同类型资源的可及性和获得机会来灵活地开展生计活动。他们可以通过参加农业技能培训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这不仅能够增加他们的创收机会,还有助于他们应对突发危机,而加入移民网络组织可以促进他们进一步获取有效资源(Pandey et al., 2017)。

全球化进程将村庄更紧密地纳入全球市场,南方国家加速转向工业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劳动力迁移、汇款和小规模商品化农业逐渐成为农村生活的特征(Borras, 2009)。因此,使用生计框架作为理论工具的学者虽然关心小农如何存续的问题,但他们也赞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渗透已经使乡村的生计机会发生了调整,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农放弃土地和农耕而加入雇佣劳动者队伍(Scoones, 2015)。

#### 四、中国流动农业工人的现状与未来

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单位之一。无论是农业企业还是种植大户,抑或是合作社,以雇佣劳动替代家庭劳动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主要的劳动体制之一,也是农业生产中的必然趋势。有些经营体会选择雇佣本地农民作为农场工人,以协调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潘璐,周雪, 2016;徐宗阳, 2016),而有些农场则偏好从外地雇佣专业的流动农业工人团体,以应对本地劳动力数量不足、技术能力不匹配、管理困难等问题(陈航英, 2020)。专业的流动农业工人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明代以来出现的关中麦客就是典型的流动农业工人代表,有学者将他们视作在区域人口过剩和极度贫困状态下产生的“季节性移民”,是古代关中地区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秦晖,金雁, 2019:80),还有历史文献以“下苦人”的说法来描述这一群体的身份特征(侯登科, 2010:11),这些证据可以洞见他们在历史上的生存状态。

尽管麦客已经逐渐被现代化机械收割所取代,但在一些商品化农业地区,对流动农业工人的劳动力依赖依旧明显。例如,每年春季有大量采茶工人到福建、浙江等茶叶产区从事短期采茶工作,有数据显示,浙江省安吉县每年需要约18万名外省采茶工人<sup>①</sup>。再例如,每年夏秋之间进入新疆地区的近百万采棉大军会在棉田度过近三个月的时间(包锐,李开南, 2008)。还有研究发现,一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由于缺

<sup>①</sup> 赚得了钱,回得了家!安吉守护18万外省采茶工安全回家, [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1841805&from\\_channel=52e5f902cf81d754a434fb50&from\\_id=1841814](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1841805&from_channel=52e5f902cf81d754a434fb50&from_id=1841814)。

乏特殊劳动技能,因而选择在城郊地区的都市农业部门就业(李强,1999),学术界为了强调他们不同于农民工的特殊属性,大多采用“农民农”的概念来刻画其流动者身份<sup>①</sup>,一部分“农民农”直接受雇于农场成为农业工人,还有一部分则在当地租种土地成为“代耕农”(黄志辉,2013)。

此外,我国还存在大量跨境流动农业工人群体,例如在中缅边境的云南镇康县,砍蔗高峰期约有2万名缅籍工人入境从事甘蔗砍收活动(汪淳玉,2022),广西崇左市每年有5万砍蔗工人缺口需要由越南工人填补(韦福安,2014)。跨境流动的农业工人进入中国,补充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劳动力缺口,再生产了区域文化,也再生产了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的秩序和社会结构(周大鸣,2022)。可见,流动农业工人在我国农业产业中占据着重要的现实地位,尤其是在季节性特征明显的特色作物种植区域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种植区。

从社会的整体协同发展来看,流动农业工人之于农业部门的价值与进城农民工之于工业部门的价值不相上下,他们都是产业发展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流动农业工人为特殊作物种植区提供了必要的农业劳动力,尤其缓解了农业劳动力季节性不足的问题,进一步确保了我国粮食安全和特殊农产品供应安全。这种就业方式顺应了大部分农民的劳动技能,尤其契合那些超龄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劳动能力,能够成为他们重新投入社会生产并补充家庭生计的途径之一,从宏观层面也实现了劳动力资源在季节和区域之间的调配。然而,这一群体和这种劳动体制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目前学术界不仅缺乏对这一群体数量和劳动力结构的总体掌握,也对其流动的时间规律和空间规律知之甚少,更缺少对组织过程的深入研究,对其劳动方式、劳动环境、劳动保障等方面的关照明显不足。因此,本文呼吁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提高对该群体的重视程度,以更规范的市场规则、更严密的政策保障、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营造良好的农业工人流动环境。

#### [参考文献]

- 包锐,李开南,2008. 百万采棉大军进新疆. 中国经济周刊(42): 14-21
- 伯恩斯坦,2011. 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汪淳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陈航英,2020. 田野里的工厂:资本化农业劳动体制研究——以宁夏南部黄高县菜心产业为例. 开放时代(3): 168-187
- 侯登科,2010. 麦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黄志辉,2013. 珠三角“代耕农”概念廓清:历史、分类与治理.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84-89
- 考茨基,1955. 土地问题. 梁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up>①</sup> 杨君,2013. “农民农”:农民发展新动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18日。

- 李,2016. 使其生,任其死?——乡村土地剥夺与剩余人口保护//叶敬忠. 农政与发展当代思潮:第一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强,1999. 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社会学研究(3): 95-103
- 列宁,1957.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曹葆华,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卢现祥,朱巧玲,2012. 新制度经济学:2版. 卢现祥,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201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 潘璐,2012. “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34-48
- 潘璐,周雪,2016. 资本农场中的农业雇工:剥夺与异化——对四川葛村资本农场的实地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15-24
- 秦晖,金雁,2019.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3版.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舒尔茨,1990. 论人力资本投资. 吴珠华,等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斯科特,200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程立显,刘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汪淳玉,2022. 跨国农业女工:流动规律、劳动状况及其农政变迁意涵. 妇女研究论丛(3): 74-84
- 韦伯,1997.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甘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韦福安,2014. 越南砍蔗女工的跨国流动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72-77
- 吴晓燕,2006. 现代小农经济:一种新解释——兼评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 44-47
- 徐宗阳,2016. 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5): 63-87
- 叶敬忠,2022. 农政问题:概念演进与理论发展. 社会学研究(1): 23-45
- 叶敬忠,贺聪志,许惠娇,2019. 生计框架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 8-15
- 叶敬忠,汪淳玉,2018. 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1-11
- 叶敬忠,吴存玉,2019.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社会学研究(2): 1-24
- 叶敬忠,张明皓,2021. 恰亚诺夫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 开放时代(3): 47-59
- 周大鸣,2022. 广西凭祥跨境越南劳工的形成与特征. 广西民族研究(4): 162-171
-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Heller-Roazen, Daniel,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akom, Uzochukwu, Chukwunonso Gerald Iheoma, 2014. Impact of migrant remittances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outcomes in Sub-Saharan Africa. IOSR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8): 33-44
- Andreas, Joel, Shaohua Zhan, 2016. Hukou and land: market reform and rural displacement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4): 798-827
- Bogoeski, Vladimir, 2022. Continuities of exploitation: seasonal migrant workers in Germa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4): 681-702

- Borras, Saturnino M. Jr., 2009. Agrarian change and peasant studies: changes, continuities and challenges-an 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 5 - 31
- Cahn, Miranda, 2006.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micro-enterprise and cul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case studies from Samoa. Doctoral Thesis. Palmerston North: Massey University
- Çaro, Erka, Ajay Bailey, Leo J. G. Van Wissen, 2014. Exploring links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lbania: a view from internal migrant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3): 264 - 276
- Carvajal, Lidia, Miguel Ángel Mendoza González, Judith I. Stallmann, 2023. Motivations of Mexican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Canada's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program. *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323): 153 - 178
- Caxaj, Susana, Maxwell Tran, Stephanie Mayell, et al., 2022. 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deaths in Ontario from January 2020 to June 2021: a qualitative descrip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1): 98
- Chambers, Robert, Gordon Conway, 1992.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Cohen, Amy, Elise Hjalmarsen, 2020. Quiet struggles: migrant farmworkers, informal labor, and everyday resistance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2 - 3): 141 - 158
- De Haas, Hein, 2010.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 227 - 264
- De Rosa, Marcello, Luca Bartoli, Sandra Leonardi, et al., 2019. The contribution of immigrants to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al systems in Italy. *Sustainability*(17): 4641
- Escobar-Latapi, Agustin, 1999. Low-skill emigration from Mexico to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situation, prospects and government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1): 153 - 182
- Favell, Adrian, 2008. The new face of East-West migration in Europ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5): 701 - 716
- Fitting, Elizabeth, Catherine Bryan, Karen Foster, et al., 2023. Re-centering Labour in local food: local washing and the growing reliance on permanently temporary migrant farmworkers in nova scotia.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3): 973 - 988
- Foster, John Bellamy, Robert W. McChesney, 2017. The global 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Class: The Anthology*(2017): 485 - 502
- Furubotn E G, Richter R, 2010.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Goldring, Luin, Carolina Berinstein, Judith K. Bernhard, 2009. Institutionalizing precarious migratory status in Canada. *Citizenship Studies*(3): 239 - 265
- Gyapong, Adwoa Yeboah, 2020. How and why large scale agricultural land investments do not create long-term employment benefit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 of labour regulations in Ghana. *Land Use Policy*104651
- Hennebry, Jenna L., Janet McLaughlin, 2012. 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health risks, and consequences for temporary migrant farm workers in Canada//Lenard, Patti Tamarra, Christine Straehle. *Legislated Inequality: 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in Canada*. Montreal: 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17 – 138

Htay, Mila Nu Nu, Swe Swe Latt, Khine Sandar Maung, et al. ,2020. Mental well-being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Myanmar migrant workers in penang, Malays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6/7): 320 – 327

Huy, Huynh Truong, Walter Nonneman,2016. Economic effe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farm households in the Mekong river delta region of vietnam.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1):3 – 21

Kalleberg, Arne L. ,2009.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1 – 22

Kaur, Navpreet, Amanpreet Kaur,202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COVID-19 and agrarian Labour relations in Punjab, Indi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3):638 – 650

King, Russell, Aija Lulle, Emilia Melossi,2021.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griculture-migration nexu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85):52 – 58

Lenard, Patti Tamara, Christine Straehle,2012. *Legislated Inequality: 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in Canada*.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Lewis, W. Arthur,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2):139 – 191

Li, Tania Murray,2011. Centering labor in the land grab Debat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 281 – 298

Massey, Douglas S. ,1987.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6):1372 – 1403

McDowell, Kevin,2003. Japan in manchuria: agricultural emigration in the Japanese Empire, 1932—1945. *Eras Journal*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at Monash University)

McLaughlin, Janet Elizabeth,2009. *Trouble in our fields: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among Mexican and Caribbean migrant farm workers in Canada*. Doctoral Thesi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McLaughlin, Janet, Jenna Hennebry,2015. Managed into the margins: examining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anada // Howard-Hassmann, Rhoda, Margaret Walton-Roberts, eds. *The Human Right to Citizenship: A Slippery Concep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76 – 190

Meikle, Sheilah, Tamsin Ramasut, Julian Walker,2001. *Sustainable urban Livelihoods: Concep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London: Development Planning Unit

Mines, Richard, Douglas S. Massey,1985. Patterns of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wo mexican communitie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2):104 – 123

Minkoff-Zern, Laura-Anne,2018. Race, immigration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farmworkers becoming far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2):389 – 408

Molinero-Gerbeau, Yoan, Ana López-Sala, Monica Șerban,2021. On the social sustainability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 dependent on migrant workers. *Romanian Workers in Spain's Seasonal Agriculture. Sustainability*(3):1062

Munck R,2013. The precariat: a view from the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5):747 – 762

Navarro-Gambín, Pedro, Kees Jansen,2024. 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search of a dignified life:

labour conditions as a source of vulnerability in Spain. *Sociologia Ruralis*(1):126 – 148

O’Laughlin, Bridget, 2022. No separate spheres: the contingent reproduction of living labor in southern Af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6):1827 – 1846

Pandey, Rajiv, Shashidhar Kumar Jha, Juha M. Alatalo, et al. , 2017.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based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for Himalayan communities. *Ecological Indicators*(79):338 – 346

Peard, Billy, 2013. Farm laborers,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Encyclopedia of Global Human Migration*(3):1413 – 1417

Pelek, Deniz, 2022. 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mong seasonal migrant workers: from temporary tents to new rural ghettos in southern Turke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1):54 – 77

Perry, J. Adam, 2020. ‘Escaping’ managed Labour migration: worker exit as precarious migrant agency. *Identities*(4):423 – 441

Pfeffer, Naomi, 1998. Theories of race, ethnicity and culture. *BMJ*(7169):1381 – 1384

Portes, Alejandro, 2014.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conciling opposite view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5 – 22

Preibisch, Kerry, Gerardo Otero, 2014. Does citizenship status matter in Canadian agriculture?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for migrant and immigrant laborers. *Rural Sociology*(2):174 – 199

Reichert, Joshua S. , 1981. The migrant syndrome: seasonal U. S. wage labor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entral Mexico. *Human Organization*(1):56 – 66

Rothenberg, Daniel, 1998. *With These Hands: The Hidden World of Migrant Farmworkers Toda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obie, James R. , 1964. *Revolution on the Pampas: A Social History of Argentine Wheat, 1860—191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coones, Ian, 2015.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ugby: Practical Action Publishing

Scott, James C. ,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ark, Oded, J. Edward Taylor, 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ded stark. *Demography*(1):1 – 14

Stark, Oded, J. Edward Taylor,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408):1163 – 1178

Stolcke, Verena, 1988. *Coffee Planters Workers and Wives: Class Conflict and Gender Relations On Sao Paulo Coffee Plantations*. London: Springer

Tanle, Augustine, 2015. Towar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links between migration and livelihoods.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5):257 – 264

Thetkathuek, Anamai, William Daniell, 2016. Migrant workers in agriculture: a view from thailand. *Journal of Agromedicine*(1):106 – 112

Thomas, Edward H. , 2020. ‘Forgetting’ to survive: black Jamaican masculinities in Canada’s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 program. *Gender, Place & Culture*(12):1785 – 1805

Todaro, Michael P. , 1977.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Problems*

and Policie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d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Weiler, Anelyse M., Janet McLaughlin, Donald C. Cole, 2017. Food security at whose expense? A critique of the Canadian temporary farm Labour migration regime and proposals for chang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4): 48 – 63

Weiler, Anelyse M., Gerardo Otero, Hannah Wittman, 2016. Rock stars and bad apples: moral economies of 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nd precarious farm work regimes. *Antipode*(4): 1140 – 1162

Wolford, Wendy, 2010. *This Land is Ours Now: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and in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Yan, Xiaohuan, Siegfried Bauer, Xuexi Huo, 2014. Farm size, land reallocation, and labour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4): 303 – 315

Zajak, Sabrina, Niklas Egels-Zandén, Nicola Piper, 2017. Networks of labour activism: collective action across Asia and beyo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bate. *Development and Change*(5): 899 – 921

## 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Dynamic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UN Yuqi LIU Yanglin ZHANG Sen

**Abstract** The role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topic within agrarian studies, an academic field steeped in a rich scholarly tradition. Research in this domain includ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labor force's mobility and it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agriculture, land, peasants, and rural communities. This paper reviews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in international agrarian studies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s, attribute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shaping the phenomenon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It presents the core perspectives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from five classic agraria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Marxism, Populism, Neoclassical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Postmodern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Livelihood Framework. It highlights the intricate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study of this dynamic labor force. In China, the substitution of family labor with hired labor is an integral aspec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 process particularly visible in the production of specialty crops, such as vegetables and fruits, where the engagement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evalent. This labor practice is identified as the key mechanism to meet seasonal labor requirements and is crucial in maintaining the steady supply of these specialty crops.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calls for greater scholarly and policy attention to the plights and prospects of migrant agricultural workers in China to foster a more equitable, regulated, and supportive migratory environment.

**Keywords** Migrant labor; Agricultural workers; Labor system; Agrarian transformation